

# 元明清时期长江下游民众的武当山进香之旅

梅 莉

提 要：武当山进香风俗的形成至迟不晚于宋代，到明代达鼎盛，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香客，清代有衰减，但仍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长江下游民众自元代开始来武当朝斋，经明清两代，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这期间长江下游人朝武当山的原因除明代武当山地位的尊崇、武当宫观陈设的穷极富丽及武当山自然景观的丰富外，还与长江下游自南宋以来真武信仰的兴盛有关。

梅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

主题词：武当山 道教 朝山 进香 真武信仰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武当”最早出现在汉代文献中，汉末至魏晋隋唐时期，武当山是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地；至宋代，道经始将传说中的真武神与武当山联系起来，以朝拜真武神为目的的武当山朝香活动开始兴起。入明以后，由于明成祖的极力推崇，真武的地位扶摇直上，武当山也因之被封为“太岳”、“玄岳”，成为“天下第一名山”，真武信仰的全国中心地，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朝山香客，香火之旺盛只有五岳之首的泰山可与之相比。清代的武当山失去了“皇室家庙”的殊荣，地位大为下降。它对周边地区和区域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朝山进香民俗来体现。从元代起至清代，武当山的香客主要来自于黄河以南，其中就有长江下游人的身影。

## （一）

宋代是武当山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它与道教大神真武神拉上了关系，自此以后，在世人眼中，武当山成为真武神修道与成仙之地，并逐渐成为真武神信仰的中心。宋代皇帝推崇道教，信奉真武之神，在武当山兴建、扩建宫观多处。如宋真宗时将唐代五龙祠升为观，孝宗时赐灵应观额；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创建紫霄宫，有“敕额文据”<sup>①</sup>，即有皇帝所赐匾额的有关文件。道士修建的宫观更多，有九室宫、王母宫、紫虚宫、紫极宫、延长宫、佑圣观、云

霞观、玉仙观、冲虚庵、白雪庵、威烈王庙、黑虎祠、大顶天柱峰石殿等。武当山不仅建有众多宗教活动场所，而且已有较大的教团组织。绍兴十一年（1141）茅山高道孙寂然入武当兴复五龙诸庙，宋高宗诏赴阙庭，符水称旨，敕度道士10人；理宗时又敕道士曹妙观领住山之职，从此开创了朝廷授职于武当道士之例。教团势力的形成和宫观的修建，不仅吸引了周边地区信徒的朝拜，诚如宋代李方叔《武当山赋》所咏“民俎豆之，其情则亲”<sup>②</sup>，而且达官贵人、士绅也来武当山祈祷<sup>③</sup>。

在武当山的石垭口今天还保存有宋代“摩崖”：“绍兴庚辰仲春十有一日吴兴陶定安世来游，下视俞公岩，四揖群峰，不知身在人世，刻名于此，用纪岁时。寺僧元照、祖祥从行。住山善慈刊。”<sup>④</sup>。吴兴（即今浙江湖州）人陶姓之人（姓陶名定字安世）在寺僧陪同下，于绍兴三十年（1160）游览了武当山，并在今武当山上十八盘尽头九渡峰的要道口留下了摩岩。惜由于资料的欠缺，我们无法断定此人来武当山的目的是专程来访，还是因事路过附近而顺带游玩，但可以肯定的是，已有长江下游的人来武当山游览。与唐以前只是修道者隐居的天下相比，武当山在宋代已有显著的变化。

武当山形成大规模的信仰活动开始于元代。元代的武当道士编刊了《武当福地总真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教经书，使真武神在武当山

修仙得道的故事更为丰满完善，真武附着武当的观念愈益深入人心；甚至文人士大夫也认为武当之得名便是“以玄武神居之”<sup>⑤</sup>的缘故。武当山成了世人崇奉的真武道场，香火也比宋时更旺。元代《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中《宫观本末·五龙灵应宫传记》曰：“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均州知州王德显，奏降敕牒，赐‘灵应观’为额。有碑存焉。至元二十六年（1279），玄教宗师江淮总摄张真人，改升宫号……每岁上巳重九，行缘受供，谒者辐凑，潇洒清绝，莫此为最。”《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中《宫观本末·紫霄宫》云：“行缘受供，一如五龙。”<sup>⑥</sup>每年农历三月三日，是玄帝诞生日，时值农闲，各地信士朝山游春，多达数万人，“三月三日，相传神始降之辰，士女会者数万，金帛之施云委川赴”<sup>⑦</sup>。《武当山纪胜集·圣诞朝贺》诗云：“一万诚心万圣真，祝香何处不身亲。年年春月如朝市，海角天涯也有人。”<sup>⑧</sup>每年秋至九月九重阳节，农作物收获已毕，获得好收成的农民怀着对神的尊敬和感激，背着祭礼朝山进香。《武当山纪胜集·上升朝贺》诗云：“武当如布满乾坤，冲举皆亲见帝尊。大顶根头高第一，登高雷拜谒天关。”

现存武当山志表明，长江下游一带元时即有朝武当的习俗。至元丁丑岁（1337）春天，“浙西道平江路昆山市船居大檀信士沈道升，偕室张氏妙果、妻父张森、妻母李氏妙贞、侍父沈文得家眷等，崇真奉善，乐施净贿，收选丰块沈香，命处士雕镂玄帝、圣父、圣母牌座三面，龙凤拥簇，其势飞跃。溯舟而上，来诸名山，入于大顶天柱峰，永充供养。……又蒙发心劝化善信，同施金资，置买长生福田，供真斋道。其积善种德普福之心，夫岂浅浅者耶！谨勒舍财名姓于后，共垂光远云耳。上海县信士郑道英、昆山州沈道升、陆添祐、陈道俊喜舍钞锭。”<sup>⑨</sup>来自于平江路昆山州（即今江苏太仓）沈道升一家，乘船西上来武当，不仅献上沉香圣像，而且用募化善信的钱及自己的资金，购买田地，献给天一真庆宫即南岩宫。他所募化的信士有同乡，也有上海县（即今上海）人。

武当山朝山进香之风在明代达到鼎盛，这与明代真武信仰的兴盛和武当山地位的显赫是分不开的<sup>⑩</sup>。来武当进香的香客遍及全国各地。地理学家王士性云：“太和山……山既以擅宇内之胜，而帝又以其神显，四方士女，持瓣香戴圣号，不远千里号拜而至者，盖肩踵相属也。”<sup>⑪</sup>其中尤以

黄河以南居多，而长江下游之香客占有一定的比重。晚明谢肇淛《五杂俎》载：“均州之太和山，万方士女骈阗辐辏，不减泰山，然多闽、浙、江右、岭、蜀诸人，与元君雄视，无异南北朝矣。”<sup>⑫</sup>元君即泰山女神碧霞元君，在明代已取代泰山神的地位，成为民众朝拜泰山的最重要的神灵，在这里，元君也就成为泰山的指称。明代武当山与泰山，成为南北两大进香圣地。凡此充分说明了武当山在明代的进香游乐盛况。

安徽徽州地区及凤阳府（治今安徽凤阳）明代也盛行朝武当之风。当时的程图和路引多记有从徽州经江西进入湖北至武当山的水路，或由徽州经河南到武当山的陆路，并附载有武当山各宫观的景致（详下）。今武当山紫霄宫保存的一对铁制蜡台是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安徽歙县信士捐资敬献的。武当山文物珍品陈列馆有一尊神像，上有铭文“徽州府休宁县信士汪汝荣喜铸邓元帅圣像一尊，祈保合家清吉。万历二年秋月立”。武当山南岩宫有多通安徽人进香后留下的摩岩石刻。如“万历十二年二月望月”的《八宫建醮碑记》，载“大明国直隶徽州府歙县人民奉道朝山进香，建醮保安”事，信士有王世科、程永伦、张上林、吴之彦等人；万历十三年二月的《八宫建醮碑记》是“大明国直隶徽州府”信士所刻；《□□接朝御圣八宫四观》云：“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信士刘□室人汪氏……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吉日”，是休宁县一家人朝山之后所留下；留下《八宫一观建醮碑记》的信士则来自于“大明国直隶凤阳府”。

明代，江苏太湖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等地的民众赴武当山进香的船队颇具规模。大约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每年农历二月，进香客在无锡县北门外的北塘“莲蓉湖”集合，进香船队多达百十艘乃至数百艘，每船载香客二三十名，每人悬灯一，浩浩荡荡，从无锡出发，经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襄阳等都邑，直达武当山，全程3000多里，来回需要两至三个月时间不等。这种进香旅行活动，每年举行一次，一直持续到明末。由于年复一年的接连举办香船“齐帮”活动，故无锡“北塘香灯”水上盛会竟成为一年一度的民俗节日。明末清初无锡人王永积在《锡山景物略》中描述了这一盛况：

香灯，他邑未有也。岁二月无定日，巨舰百十艘，无定类，乃苏人之武当山进香

者，蠲吉启行，至北塘，谓之齐帮，毕集焉。其来以鸣锣为号，自南而东而北，声振林木。邑人士及大家宅眷闻声，遂空国出。其灯贯索于高墙之首，各系灯架，或四方，或八角，空其中而悬于旁，灯灯相续，联属而下，如贯珠，如星桥，其灯类以人类为准，每进香一人，人悬一灯，每舟若干人，即悬若干灯。灯光入水，灯灯倒映；每舟悬若干灯，每舟底部映若干灯。悬灯后，花炮四发，烟花入水，亦倒映，枝枝朵朵，上下一色，于是香船有计。看香灯之船千计。香灯悬于墙顶，看香灯船之灯悬于舷窗；香灯纯用纸灯，看香灯船之灯间以纱灯、珠灯、水晶羊角灯；香船纯锣声，或木鱼声，看香灯之船，佐以歌声、笑语声、箫鼓声、吹弹丝竹声，人烟如沸，水面通红，至宵分始散。过昆陵无北塘大水，舟不复聚，灯不再悬矣。香灯，他邑未有也。自楚中多事，声影寂然。<sup>⑬</sup>

对太湖居民一年一度朝武当的详细情况顾文璧有专文进行探讨<sup>⑭</sup>，此不赘述。苏州玄妙观有由钱允治撰、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立石的《玄妙观真武殿重修六亭记》，载有吴县（即今吴江）信士钱溥惠朝武当山事，其文云：

元妙观真武殿前为亭者六，元坛、关公、灵官，并纸舫、井亭、碑亭，既日久倾圯，莫有举其事者。万历乙未正月三日，吴县清信士钱溥惠将朝武当，在殿焚香，欲祈途路平康，始许修理，行迫，未遑也。二月二十四日回舟黄石矶，风涛大作，惠复告天，指誓不负初盟，遂得元贶昭彰，归棹无虞云。乃涓于本年八月□日竣工饬徒，梁柱之朽者，易以良材，砖瓦之坏者，易以坚埴，革故鼎新，轮奐恧翼，远近归美焉。<sup>⑮</sup>

名黄石矶者，有两处，一在今湖北黄石市长江中，亦名西塞山，另一处在今安徽东至县东北<sup>⑯</sup>，而以后者更为知名。从元月三日启程，到二月二十四日至黄石矶，已费50余天。看来从吴县朝武当，来回共需要两个来月的时间。又史载松江（即今上海松江县）富人丁生，壮年无子，其妾有妊，就向所供奉的真武神祈祷，云：“如生男，长成当亲携上太岳烧香，以谢神呪。”不久果真得了一个儿子。等到儿子长到6岁，丁生即携他至武当山进香<sup>⑰</sup>。

入清以后，真武信仰在清代官方祀典中的地位不太高，这一方面与道教整体衰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则是清廷有意识地抑制的结果。由于真武是明皇室的护国家神，清室入主中原后，便有意贬低真武，大大降低其祭祀的规格与礼仪，转

而大封其他神灵，突出的如妈祖、文昌等。在中国这样一个神权始终受皇权支配的国度里，其信仰对象神格地位的高低，往往要看各代皇帝的推崇程度。失去朝廷大力扶持的真武神，其地位的下降是不可避免之事。随着真武神失去了统治者的大力扶助，武当山也不再享有明代种种特权，虽未断香火，却已呈强弩之末，不见昔日风采。特别是自乾隆（1736—1795）末年爆发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后，直至咸丰（1851—1861）、同治年间（1862—1874），武当山所在的鄂西北战事连年，山上数以百计的宫观庵堂相继毁于战火，到清末全山所存较完整殿宇不足3千间，仅是明代2万多间的零头了<sup>⑱</sup>。绵绵的烽火，动荡的社会，阻止了香客的步伐，特别是距离较远的香客朝山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武当山香客人数不仅锐减，而且地域范围大为缩小。在晚清、民国人的心目中，武当山再也不属于香火旺盛的名山胜地了<sup>⑲</sup>。

从明代人心目中南方的进香中心，到晚清不再是跨省的著名进香地，这不仅预示着武当山地位的衰落，也意识着跨省进香的香客大幅度的减少。以苏州府为中心的江苏香客就再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朝武当的旅行。今存武当山的器物铭文表明，清以后到武当进香的江苏香客多是在汉口和襄阳等地寄寓或寓居之人，主要为工商业者。

不过，在安徽，入清以后，这种进香风俗仍有持续。清乾隆年间（1736—1795）立石的太子坡功德碑中，记载了安徽泾县（即今泾县）、凤台（即今寿县）、歙县（即今歙县）等地信士进香捐资的情况；南岩宫的《善有余庆》碑，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载有安徽黟县信士捐资事；另一《表杨善行》碑，是民国丙寅年（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仲春南岩宫道总所立，记“江南安徽省凤阳府凤台县”50人捐功德钱事，其中3人捐大洋参元，7人捐貳元，26人捐壹元，余则一千至二千钱不等；太和宫九连镫墙壁上有题为《万古不朽》的碑文，“中华民国拾七年岁次戊辰七月初九日全立”，即立于1928年。文曰：“江南安徽省凤阳府凤台县募化道人夏长生众善人名目列后……尝思金顶香炉昔人铸造焕然华丽，历年也□多金炉缺少左□。余不憚千里而步朝……思玄帝自睹心伤，遂回故里募化仕人君子捐囊□之。余□助仓廩之积粟以修缺翅。伏愿圣仁……募化道人夏长生、陈国庆……氏缘人”约80余人。金顶香炉即金殿前六角铜炉，铸造于明嘉靖二十五年

(1546), 到 1928 年已有 382 年, 凤台县信士夏长生等人不远千里朝顶时, 见其左翅缺少, 回乡募资重修, 捐款之人达 80 余人。

## (二)

朝山进香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这种活动所依托的基本条件就是畅通的大道。武当山虽僻处鄂西北, 但因位处南北交界地带, 交通尚称便利。特别是唐宋以后随着宫观庙宇的兴修, 香客朝山进香风俗的兴盛, 武当山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山内山外的交通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从长江下游来武当山进香主要有两条道路, 即北路与南路。北路为陆路, 南路主要是水陆。明代休宁(即今安徽休宁)商人黄汴于隆庆四年(1570)所撰《一统路程图记》中已有“瓜洲至武当山路”、“湖口县至武当山水、陆路”。其自序云:

余家徽郡万山之中, 不通行旅, 不谙图籍, 土狭人稠, 业多为商。汴弱冠随父兄自洪都至长沙, 览洞庭之胜, 泛大江, 溯淮、扬, 薄戾燕都。是年, 河水彻底, 乃就陆行, 自兗至徐, 归心迫切, 前路渺茫, 苦于询问, 乃惕然兴感, 恐天下之人如余之厄于岐路多也。后侨居吴会, 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 得程图数家, 于是穷其闻见, 考其异同, 后复校勘, 积二十七年始成秩。<sup>⑨</sup>

可见, 他不仅利用经商之便, 了解各地水陆里程, 而且收集各种程图路引, 考订异同, 加以校勘, 费时 27 年始成此书。足见至迟在嘉靖年间(1522—1566)这些朝山道路已形成, 也就是说, 江南诸郡民众朝武当山已形成较大规模。

### (1) 北路

明代商人黄汴于隆庆四年(1570)所撰的《一统路程图记》卷 6《江北陆路》之 7“瓜洲至武当山路”载江南行省香客到武当山之路:

瓜洲。三十里新城。十里仪真县。七十里六合县。四十里姜家渡。去。十五里雷官集。三十里水口集。四十里滁州。三十里朱龙桥。二十里雅店。去。三十里藕塘。三十里东铺。去。三十里定远县。三十里西铺。三十里永康镇。四十里白鹭桥。四十里姚泉。四十里中心渡。去。十里寿州。三十里斗鸡铺。三十里正阳。十五里蔡涧。二十里颍上铺。二十里颍上县。六十里中铺。六十里颍州。五十里天蓬集。三十里姚家店。二

十里长官店。二十里李铁集。二十里瓦店。二十里姜寨。四十里杨埠。四十里苏家店。二十里大柳树。二十里汝宁府。三十里老君堂。三十里韩庄。四十里确山县。二十里常家店。去。十里邢家店。去。十里尾冈铺。十五里沟竹。二十里节敬山。十五里邓庄。三十里曹官驿。五十里泌阳县。三十里显灵店。二十里大河屯。二十里黄家店。三十里唐县。二十里张家店。三十里余家饭(当为店字)。十五里田九店。二十五里冈头。二十里黄庄。去。二十里鸡滩。四十里邓州。二十里茶店。二十里九重院。二十里武家店。二十里李大坟。三十里党子口。四十里石鼓关。三十里嵩平。二十里方山。二十三里槐树关。五里粉红渡。渡。均州。二十里石版滩。二十里草店。蓬莱门。仙关。共三十里太子坡。紫霄宫。南岩宫。榔梅祠。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共三十里玄帝殿。有“去”之处, 不可宿。<sup>⑩</sup>

瓜洲位于今江苏扬州城南 16 公里处的江中, 与镇江相望。瓜洲形成于汉代, 因形如瓜, 故名。自隋唐运河通航以后, 瓜洲成为由古运河入江的必经之道而日益繁华。到清代初叶, 由于运河漕运发达, 瓜洲更显繁盛, 康熙、乾隆数次南巡, 都巡游过瓜洲。后因长江水道的变化, 瓜洲逐渐坍塌, 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全部沦于江中。今日的瓜洲是后来重建的<sup>⑪</sup>。来自于江南的香客或水路, 或陆路至瓜洲, 经今江苏、安徽, 入河南, 由河南的邓州, 再经党子口、方山、槐树关、粉红渡、均州、石板滩(按: 即引文中的“石版滩”)、草店至武当山。

明天启六年(1626)刊刻的《士商类要》卷 1 之 3“南京由汝宁府至武当山路”<sup>⑫</sup>、詹漪子所编《天下路程图引》<sup>⑬</sup> 卷 1 之 3“南京由汝宁府至武当山路”与《一统路程图记》卷 6“瓜洲至武当山路”的滁洲至武当山一段的线路大致相同<sup>⑭</sup>, 只是起点由瓜洲改为南京。可见此条进香路在明代中叶以后一直较为繁忙, 为各种路引所必载, 也反映了江南各省进香武当山的香客数量不少。

### (2) 南路

明代商人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 7《江南水路》之 20“湖口县至武当山水、陆路”记:

本县。六十里九江府。八十里龙坑。三十里武家穴。三十里蟠唐。对江富池驿。三

十里马口。十里杀人港。廿里蕲州。三十里渔阳口。三十里道士汭。廿里散花料。廿里回风矶。廿里兰溪驿。四十里巴河。三十里黄州府。四十里三江口。三十里团风。三十里矮柳铺。三十里双流夹。廿里抽分厂。十里阳逻。廿里沙口。北去黄陂县。西廿里马公洲。廿五里汉口。六十里蔡店。四十里云口。西去竹筒河。北四十里至汉川县。九十里尖刀嘴。四十里狮子河。二十里渔泛洪。三十里黑牛渡。三十里卢埠。四十里史港。三十里车罗院。三十五里新城。十里沙阳。十里小河口。八十五里石碑。四十五里承天府。陆路。廿里池河渡。三十里盛家店。四十里丰乐河。三十里龙王洲。渡。六十里宜城县。三十里毛家港。渡。廿里潼口。六十里襄阳府。对樊城。六十五里砖桥。六十里蔡店。三十里谷城县。渡。四十里石花街。七十里界山。五十里草店。<sup>⑤</sup>

这是一条水陆兼行、以水路为主的官道。与江南镇江至湖口线相连。长江中下游的香客由湖口逆长江干流经汉口入汉水上溯至襄阳，由谷城，经石花街、界山、草店入武当山。

《士商类要》卷1之3“徽州府由景德镇至武当山路”<sup>②7</sup>、清代詹漪子所编《天下路程图引》卷1之3“徽州府由景德镇至武当山路”，均由徽州经景德镇、湖口、汉口至樊城，与上述道路相同，只是在襄阳与上述道路分道：

襄阳府。对河樊城。九十里至柴店冈。九十里光化县。六十里小江口。九十里均州。有净乐宫，系当原净乐国王殿基址，祖师所生之地。出南门。四十里石板滩。有迎恩宫。七里至紫阳观。一里周府茶庵。玄岳宫。二里草店。二里至沐浴堂。自在庵。修真观。一里冲虚庵。会真观。玄岳门。<sup>②8</sup>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入武当山之南路多由汉水上溯至襄阳，然后由此分道：或由光化即今老河口起船，经小江口，到均州，再南下草店，由草店入山（或直接船行至草店入山）；或由谷城、界山经草店入山，而不入均州。

### （三）

从元至清代长江下游人朝武当山的原因除顾文璧文谈到的明代武当山地位的尊崇、武当宫观陈设的穷极富丽及武当山自然景观的丰富外<sup>②9</sup>，还与长江下游自南宋以来真武信仰的兴盛有关。

周晓薇曾分析过宋元明时期真武庙的地域分布中心，指出以宋代建康、临安（今浙江杭州）及明代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真武信仰的三大中心之一<sup>③0</sup>。宋朝南渡之后，北方金人的威胁、压力越来越大，统治者希求北方神真武神护佑的心情也愈加迫切，因之，统治者在大加封号的同时，亦大力营建祭祀真武的宫观，临安遂成为崇奉真武的中心地。《梦梁录》卷八记载，南宋王朝在临安城内外建有九座御前宫观，即东太乙宫、西太乙宫、佑圣观、显应观、四圣延祥观、三茅宁寿观、开元宫、龙翔宫和宗阳宫，“多是潜邸改建琳宫以奉元命或奉感生帝，属内侍提举宫事，设立官司守卫兵士。凡宫中事务出纳金穀日膳道众修崇醮款，凡有修整宫宇及朝家给赐银帛、殿阁贴斋钱帛，并皆主继给散羽士，但沾恩甚隆，外观皆不及也。”其中的佑圣宫为真武专祠，四圣延祥观虽祀四圣（真武、天蓬、天猷、翊圣），但自北宋初，真武已名声显赫，其他三圣望尘莫及，故四圣延祥观的建立对扩大真武神的影响大有益处。开元宫的主殿衍庆殿祀真武，在东太乙、宗阳宫中亦建有大殿以“奉佑圣”，凡此可见真武神在宋室朝廷的地位。上有毫发之行，下有丘山之效。由于皇室对真武的大力推崇，以临安为中心的杭嘉湖平原民间信仰便形成浓烈之风气，其表现便是真武灵应广播，祭祀真武的观堂遍建，民众信仰深刻。这种状况元代依旧<sup>③1</sup>。

宋代建康（即南京）曾为皇帝行宫，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更将此定为都城，后明成祖虽移都于北京，但南京仍是重要的政治中心，更为当时人文荟萃之中心。早在宋代，据《景定建康志》卷44的记载，建康就建有真武庙。明初因在平定天下时真武神“阴翊显佑，灵明赫奕”<sup>③2</sup>。为感谢神恩，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便将真武神列在国家祀典，立真武庙以祭祀之。明朝祀典规定，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朝廷派遣太常寺官员致祭，用素羞<sup>③3</sup>。分封外地的“诸王来朝还藩，祭真武等神于端门，用豕九、羊九、制帛等物”。至“二十六年，帝以其礼太繁，定制豕一，羊一，不用帛”<sup>③4</sup>。由于有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一带修建了大量的真武庙<sup>③5</sup>。

与真武庙具有实体形态相比，真武节更多地具有一种“虚态”。但节庆活动在民间有很强的延续性，是民间信仰最直观、最热烈的表现形式。大约从宋代开始，随着真武信仰的兴盛，道

经传说将每年的三月三日附会为真武神的誕生日，不少地方的信徒都要举行盛大的活动以示庆祝。在当时的临安，“北极佑圣真君圣诞及诞辰，士庶与羽流建会于宫观，或于舍庭。诞辰日，佑圣观奉上旨建醮，士庶炷香纷然，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诸行亦有献贡之社”<sup>⑤</sup>。由皇帝“降赐御香”举办的大型法事活动，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而三月三日真武圣诞节的进香，以佑圣观最负盛名：

三月三日上巳之辰，……兼之此日正遇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佑圣观侍奉香火，其观系属御前去处，内侍提举观中事务，当日降赐御香，修崇醮录。午时朝贺，排列威仪，奏天乐于墀下，羽流整肃，谨朝谒于陛前，吟咏洞章陈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庭。诸宫道宇，俱设醮事，上祈国泰，下保民安。诸军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观睹者纷纷。贵家士庶，亦设醮祈恩。贫者酌水献花。杭城事圣之虔，他郡所无也。<sup>⑥</sup>

文中明白指出三月三日原为上巳节，正好与真武诞节重合，作为岁时节日的上巳此时已不再风光，而作为宗教节日的真武诞节却日见兴隆，由此三月三日这一天的节庆活动完成由岁时节日向宗教诞节的转变。宋周密《武林旧事》卷3“社会”条亦记载了杭州西湖一带的每年三月三日的殿司真武会，人潮如海，场面极为宏大壮观。文中所述三月三日奉祀真武的风俗，并不仅仅盛行于杭州，其他地区也有，只不过杭州事神特别虔诚。婺州（治今浙江金华）乡俗，“每以三月三日真武生辰，阖郭共建黄箒醮，禳灾请福”，参加者达数百人之多<sup>⑦</sup>。

直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仍盛行三月三庆真武诞的风俗。南宋以三月三斋醮仪式闻名于世的杭州佑圣观，明代依旧有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也有人在家启醮，酌水献花。元代著名文人赵孟頫记载到：“岁元旦至上巳□节朔望，虎林士女，大集庭下，势若禹峡春流，胥涛秋壮，□壑赴岸，灭前拥后，推轂骑巷，休輿轿道，息武无可布视。不得留集者，亦咸严戒洁斋，澡涤洗沐，专一志虑，肃齐形容，喜怒不行，哀乐不入，好恶不作，骄吝不生，……祠之建也，施费者有差，岁三月三日斋醮费，施田者亦有差。”<sup>⑧</sup>《古今图书集成》卷946《杭州府部汇考十二·杭州府风俗考》引《续溪志》云：“三月……今初三

日为祐（当为佑）圣观真武帝君诞辰。是日有缘竿之戏。竿高数十尺，徒手直上，据竿顶左右盘旋，以腹贴竿，四体投空，忽自掷下，捷若猿猱陆陞。”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一书，也对明初杭州佑圣观庙会上表演的雀竿之技，有详尽的描述。崇祯《乌程县志》卷四《风俗》云：“三月三日，北极佑圣真君诞辰，士女杂踏，竞往北山进香，以其山有佑圣宫也。王德乾诗：喧填山北静山南，花照青龙洞口潭。万马万船人十万，三春三月日初三。又五言诗：三月三日晴，北山喧鼓声。士风参圣帝，争戴荠花行。是日男女皆戴荠花。谚曰三春带荠花，桃李羞繁华。”乾隆《安吉州志》卷7《风俗》载：“三月三日俗传北极佑圣真君诞辰，赴庙烧香念佛者甚多。”此外，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都有三月三庆真武诞的记载<sup>⑨</sup>。

江南地区的真武信仰之盛甚至还影响到云南等地的民间信仰。段玉明、蓝勇先生在研究西南寺庙文化时，都已注意到明代云南地区的真武庙、土地庙、城隍祠之类兴建尤多，以为这与云南地区移民以江南籍和江西籍为主，特别是江南籍移民尤为突出有关。因为，在江南一带，自宋以来，真武、城隍、土地神信仰兴盛<sup>⑩</sup>。的确，大量的史料证实，明代移入云南的汉人中，特别是以昆明为中心的地区，以江南地区尤多。明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云：“高皇帝既定昆明，尽徙江左诸民以实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风俗语言，皆与金陵无别。”光绪《永昌府志》卷8记载，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一带“明初迁江南人入居此地，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号小南京也……语言服食礼仪习大都仿佛江南”；明代王士性也记载道：“（永昌）而其人反红颜白皙，得山川清丽之气，而言语服食，悉与陪京同。”<sup>⑪</sup>民国《姚安县志》卷54载姚安（即今云南姚安）“汉人多吴赣楚籍人，明初随征入籍，言语清晰大类中州”。故明代人称云南“与吴会同风”、“衣冠文物风俗言语皆与金陵无别”<sup>⑫</sup>；清刘盛堂在编著《云南地志·上·人民二·种族》时亦总结到：“云南汉人在明以前者已迁至辽东、山东，今之汉人则明初自江南迁入也……”；其《人民四·风俗》篇则曰：“汉人皆徙至江南，吉凶之礼，往来之仪，一本南京，近数十年夷俗尽改从汉。”

此外，长江下游之人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当进香之旅，还与当地经济的发达相关。武当山距

江南三千余里，地跨湖广、江西、安徽和江苏四省，往返一次二三个月，路费和一路上的开支肯定不少；而武当山宫观庙宇庞大，且较为分散，香客逢庙必进，逢神必拜，施舍香钱的数额颇大，加之从明代孝宗弘治六年（1493）开始政府对香客征收香税，朝一次武当山的费用是巨大的，以至于当时流传着“穷不游武当，富不登太白”的谚语<sup>④</sup>。如果家无担粮、身无余财，要想实现朝山进香的愿望，是不可能的。明清时期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为全国首富之区，朝山进香风气之盛，亦赖经济实力予以支持。

（责任编辑：章 宏）

- ①[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中《宫观本末·紫霄宫》，《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册页656。
- ②光绪《续辑均州志》卷15《艺文志》。
- ③[南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第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册页1231。
- ④张华鹏等编著《武当山金石录》，丹江口市文化局1990年，第1册页4。
- ⑤[元]程钜夫《雪楼集》卷5《均州武当山万寿宫碑》，清宣统二年刊本。
- ⑥[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中《宫观本末·五龙灵应宫传记》，《道藏》，第19册页656。
- ⑦[元]程钜夫《雪楼集》卷5《均州武当山万寿宫碑》。
- ⑧《武当山纪胜集》是元代江西文人隐士罗霖震的一部诗歌专集。它以武当山的宫观祠庙、楼台亭阁、峰岩涧谷、潭泉溪池等名胜为歌咏对象，成书于元中期，1卷，是武当道教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专集，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纪传类》。参看郭顺玉《元代道教文学的力作——武当山纪胜集》，《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
- ⑨[明]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12《录金石第十·沉香圣像碑》。
- ⑩关于明代真武信仰的兴盛及武当山地位的显赫，请参见拙作《武当山历史地位的变迁》，《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 ⑪[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五岳游草》卷6《楚游上·太和山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121。
- ⑫[明]谢肇淛撰、郭熙途校点《五杂俎》卷4地部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70。
- ⑬[清]王永积辑《锡山景物略》（清光绪刻本）卷4《北塘香灯》，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山水志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5册页93。
- ⑭顾文璧《明代武当山的兴盛和苏州人的大规模武当进香旅行》，《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 ⑮[清]顾沅《苏州元妙观志》卷8《集文上》，广陵书社编《中国道观志丛刊》，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161—162。
- 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页781。
- ⑰[明]陆燾《庚巳编》卷8《真武灵应》，中华书

局1987年版，页91。

- ⑱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页244。
- ⑲[清]刘声木《苕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页317。
- ⑳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一统路程图记〉〈土商类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页135。
- ㉑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页166—167。
- ㉒淑慎《瓜洲古渡》，《寻根》2003年第6期。
- ㉓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土商类要》，页259—260。
- ㉔杨正泰以为《天下路程图引》原载于《土商要览》，与程春宇《土商类要》水陆路引部分的内容相同。其源流关系，有待研究，《天下路程图引》可能是《土商类要》水陆路引部分的辑本。参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前言），页4。
- ㉕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页402—403。
- ㉖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页229—230。
- ㉗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土商类要》，页248—249。
- ㉘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页362—364。
- ㉙顾文璧《明代武当山的兴盛和苏州人的大规模武当进香旅行》，《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 ㉚周晓薇《宋元时期真武庙的地域分布中心及其历史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 ㉛参见拙作《宋元时期杭嘉湖平原的真武信仰》，《江汉论坛》2005年第8期。
- ㉜[明]朱棣：《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载[明]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2《诰副墨第一》，收入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5。
- ㉝《明史》卷50《礼四》，第5册页1304；《大明会典》卷93《礼部·群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1985年，第3册页1463。
- ㉞《明史》卷49《礼三》，第5册页1277。
- ㉟周晓薇《宋元时期真武庙的地域分布中心及其历史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 ㊱[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9《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1页。
- ㊲[宋]吴自牧：《梦粱录》卷2《三月》，第9页。
- ㊳[宋]洪迈：《夷坚志·支戊卷第六·婺州两会首》，中华书局，1981年，第3册第1100页。
- ㊴陈垣《道家金石略》，赵孟頫《佑圣观捐施题名记》，第903页。
- ㊵梅莉《明清时期的真武信仰与武当山朝山进香》，武汉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8—69页。
- ㊶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表1—6、表1—8；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
- ㊷[明]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
- ㊸[明]章潢《图书编》卷42、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
- ㊹[清]刘献庭《广阳杂记》卷2，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7页。